

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經濟-社會史評論

侯建新 主编

【第一辑】

工业革命中的英国工人

从“公仆”到资本家：俄国 20 世纪末叶社会巨变

“老父亲泰晤士”：一条河流的污染与治理

中国臣民的罪感意识

西欧中世纪的自由观念

灵床上的宗教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第一辑】

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經濟-社會史評論

侯建新 主编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20030965

顾 问 费孝通 戴 逸
齐世荣 J.Hatcher (英国)

主 编 侯建新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 沛 马克垚 马 敏 朱孝远 朱 寰 向 荣
刘泽华 刘家和 刘新成 刘德斌 李文海 李剑鸣
李根蟠 杨国桢 吴景平 何芳川 余伟民 陈春声
庞卓恒 赵文洪 侯建新 钱乘旦 徐秀丽 徐思彦
徐 浩 郭小凌 黄 洋 龚书铎 彭 卫 彭小瑜
靳润成 魏宏运

C.Dyer(英国) W.Rowe(英国) L.Littrup(丹麦)

H.Goetz(德国) J.Esherick(美国) A.Macfarlane(英国)

R.Swanson (英国)

主 办:天津师范大学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心

封面题字:范 曾

本期执行编辑:王亚平

地 址:天津市六里台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300073)

网 址:<http://www.eshistory.com/>

电 话:(022)23540950 23542175(传真)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3
内容提示	7

转型与分化

工业革命中的英国工人	钱乘旦/ 9
从“公仆”到资本家：俄国20世纪末叶社会巨变	黄立葵/ 21
社会转型时期英国下层民众的贫困程度	向 荣/ 35

生态与环境

罗马与中国汉代的农业	朱 寰/ 46
生态之链：中国传统农业的启示	李根蟠/ 55
秦汉社会的山林保护意识	王子今/ 65
“老父亲泰晤士”——一条河流的污染与治理	梅雪芹/ 75

观念与体制

中国臣民的罪感意识	刘泽华/ 88
西欧中世纪的自由观念	赵文洪/ 96
清末彩票：权与利的博弈	闵 杰/ 103
协助金：都铎是专制王朝？	井内太郎/ 115

宗教与神话

灵床上的宗教	斯旺森/ 126
中世纪的死亡与彼岸概念 ——中世纪的死亡观和天堂观	格 茨/ 138
中世纪英国教士的职业生涯	刘 城/ 150
神人之际：希腊神话解析	晏绍祥 赵秋燕/ 161

人文与科学

“中国文化与科学”：钱穆、杨振宁时隔40年的对话	刘仲林/ 172
经院哲学：近代科学思维之母体	张绪山/ 185
仪式的史学解读	吴晓群/ 195

写在前面的话

《经济—社会史评论》终于面世了。所有期待着她的诞生,所有为她的诞生付出过辛苦劳动的人,所有从事经济—社会史研究或者关注这一学科的人,都为之欣喜。

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面对着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巨变的中国社会以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整个人类社会提出的种种问题。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但需要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国和外国历史上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吸收营养,也越来越需要他们从中国和外国历史上的社会生活中吸收营养。因为,整个人类的历史与现实都表明,社会生活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或者折射,也一直对它们产生影响;而且,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更加重要的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进程已经充分显示,政治经济文化越进步,越发达,人类生活的重心就越偏向于社会层面。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小政府、大社会成为大家公认的一个原则,就是很有力的证明。

当然,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密不可分。离开了经济,不但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生活,甚至也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生活的主体——人类本身。因此,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是先天与后天都血脉相连、不可分离的;研究社会生活史,必须了解某一特定时代的经济状况为前提,必须牢牢地把握社会生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发展需要一个社会整体机制的推动。毋庸讳言,我们摒弃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同时也不欣赏那种不问国计民生的社会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积极倡导与推进经济—社会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这一学科的基本特点是,从经济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和民众生活的视野对历史进行认知和诠释。

就像适应着西方社会的现实需要,经济—社会史这一学科在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蓬勃兴起,成为最具活力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一样,适应着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她也在21世纪之初的中国应运而生。2001年初秋,在美丽的天津盘山,天津师范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联袂主办了经济—社会史全国首次学术研讨会,对西方经济—社会史的概念、方法与范畴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该学科在我国本土化及其发展前景做出了积极评估。与会者一致认为:为了繁荣21世纪的中国学术,我们需要经济—社会史这样的新学科和新视角,需要使历史学更加贴近生活,更加贴近社会与现实,使历史学变得更加开阔和更加多姿多彩。令人欣慰的是,迄今为止,她已经拥有一批专业研究人员,一大批丰厚的研究成果和专门的研究机构。以天津师范大学为例,该学科被列为天津市重点发展学科,不仅有“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一个专业网站,还有一个研究基地——天津师范大学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心。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为这一学科的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交流平台,并且建立一个将学科成果推向社会的基地,就十分必要了。这就是我们创办《经济—社会史评论》的出发点,从最初的酝酿到今天刊物的问世,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刊物的主办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全体人员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之外,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市教委从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学术界同仁也热情鼓励,鼎力相助。三联书店的潘振平先生参与了最初的创意与策划。费孝通先生(著名社会学家,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戴逸先生(著名历史学

家)、齐世荣先生(著名历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名誉校长)和J.哈彻尔先生(英国《经济史评论》主编,剑桥大学经济—社会史教授)亲自担任本刊顾问。著名画家范增先生亲笔题写刊头。国内外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学界的一批知名专家组成本刊编委会,给予了宝贵的帮助和指点。创刊号上的很多文章,要么是作者们挤占别的工作时间,专门为本刊撰写的;要么是他们原来准备投给其他刊物的得意之作。三联书店对本刊的出版,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面对着中国社会的需要,凝聚着许多人大量的心血与劳动,承载着学界同人的关心与厚望,这样一份刊物,要求我们以对社会,对学术的高度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以21世纪的中国学者应该具有的开创精神,来把她建设成为具有独立个性,鲜明特色的学术园地,在众多的史学刊物中,显示其无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

那么,什么将是她的个性和特色呢?

首先,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绝大多数历史学工作者都会同意,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能满足今天和未来人类的某些需要,换言之,就是它有着现实的价值。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克罗齐才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古代历史学历数千年之久,一直保持着经世致用的传统。今天,一方面,不但国家的治理依然需从历史学中获取经验,而且几乎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社会组织,甚至每一个希望有所成就的人,客观上都有着对历史学的

需求,也就是说,历史学的服务对象,已经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要是政府,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学已经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普及的手段,能够方便而迅速地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问题是,今天,在历史学的三个服务对象——政府、社会和历史学家中,主要还只是历史学家自身在接受着历史学的服务。大多数历史学的成果基本上只在历史学家圈子里被认识、被利用。有很多成果,只有本专业的几个人,甚至一两个人感兴趣。这种现象有其合理性,因为专业学科毕竟首先是专业学科,它必须首先面对专家,有学科内部的交流,这样才会有学科的发展。另外,历史学科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冷门,许多非常基础性的领域,它们很难直接与现实需要发生联系。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切都不能成为历史学远离政府和社会的理由。恰恰相反,它们只应该是历史学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的理由。

有鉴于此,《经济—社会史评论》将旗帜鲜明地倡导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这里,“历史”是极其严格意义上的严谨的历史学学术研究成果。越是强调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就越要强调尊重历史学作为一门严谨的人文学科自身固有的规则,强调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治学,决不媚俗,决不投机取巧,决不走捷径。我们要求,发表在《经济—社会史评论》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具有学术上的原创性,都严守学术规范,在这一点

上,我们将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对每一篇稿件,我们都将请有关专家严格审定。“现实”是当代和未来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人类的和平与福祉。这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所在,是我们约稿、组稿、用稿在选题方面的基本出发点。对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在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在对未来发展方向的规划中所面临的形形色色的重大问题;世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和平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形形色色的重大问题,我们都可以从历史中得到或多或少有助理解和解决的答案。因此,发表在我们刊物上的绝大多数稿件,都必须能够对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有所启迪。同时,为了让非专业人士读得懂,我们将要求我们的作者尽可能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述他们的思想。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我们将努力探索一条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术的社会功能的途径,让人们听到“学术”二字,不但肃然起敬,而且感到亲切近人。

其次,是外国历史与中国历史的结合。人类的历史,就是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即使各个文明、各个社会相对封闭隔绝的古代,也仍然存在着彼此间的相互交往和影响。这种交往和影响的逐渐加强,就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全球化。因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在世界历史的大的坐标系内进行的话,就有可能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这是我们强调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必须

中外并举的第一个理由。我们的第二个理由是由是,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历史的角度,去寻找对某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的答案,将会更加有助于接近真理。比如,针对中国现实的环境保护问题,仅仅挑出一个国家历史上的一种经验或者教训,同列举多个国家历史上的多种类型的经验或者教训相比,哪一种方式更加具有启迪价值,就非常清楚了。我们的刊物,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刊物。我们的作者队伍的成员,不仅有治中国史的学者,更有治外国史的学者;不仅有中国的历史学家,

也有外国的历史学家。2001年在天津举办的首次全国性的经济—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治中国史的学者和治外国史的学者们济济一堂,就已经初步展示了我们作者队伍的阵容。

历史与现实,是时间之经;中国与外国,是空间之纬。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是我们刊物为广大读者和作者提供的大舞台。我们力求让这个舞台上演出的每一幕,都融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与进步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让我们共同祝愿《经济—社会史评论》茁壮成长!

侯建新

2004年9月5日

内容提示

本辑文章共18篇,内容集中于下述五个栏目:

转型与分化:人类历史上,有形形色色的社会转型,比如,从野蛮到文明,从农业到工业,从君主制到共和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等等。而每一次重大的转型,都必定会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从而导致社会的震荡。如何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实现最佳的社会转型,是人类永远的追求。本栏的三篇文章,分别探讨了工业革命中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前苏联的党政干部通过巨变后俄国的私有化而成为大资本家的过程和原因;近代早期英国下层民众的贫困程度。

生态与环境:自人类开始以自然为索取对象的生产活动以来,就一直面临着如何保持生态平衡的问题。工业化让人类在这方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今天,我们能否从我们的祖先那里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呢?本栏的四篇文章,分别探讨了罗马与中国汉代的农业;中国传统农业对生态的保护;秦汉时代人们对待山林的态度;近代英国

泰晤士河的污染与治理。

观念与体制:古代中国与西欧的政治观念与体制,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也有相同的地方。对此,历史学家们见仁见智,多有研究。本栏的四篇文章,分别探讨了古代中国臣民在君主面前的负罪感;西欧中世纪的自由观念;清末彩票问题揭示的政治体制矛盾;协助金反映出的都铎王权受制约的程度。

宗教与神话:国内学术界对西方历史上宗教与神话的研究,已经有诸多成果问世。但是,总的看来,还欠深入。本栏特约请了两位在本领域内国际知名的外国作者就中世纪西欧的宗教与死亡问题提供了两篇文章。本栏的另外两篇文章,分别探讨了中世纪英国教士的职业生涯和希腊神话。

人文与科学: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在数十年前西方学术界曾经热烈讨论过的问题。今天的中国,这两个领域之间割裂的状况非常严重。本栏的第一篇文章,记载了钱穆和杨振宁这两位

分别在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领域里独领风骚的巨匠,就这一问题时隔40年的历史性对话;第二篇剖析了看似与自然科学对

立的中世纪西欧经院哲学对近代科学思维的孕育;第三篇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人类社会中各种仪式进行了分析。

工业革命中的英国工人

钱乘旦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重组,分析了工人阶级不同组成部分的社会与经济情况,这些情况如何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造成的社会后果。文章指出,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分化不仅体现于社会整体,而且表现在工人内部。了解这一情况,对我们全面理解工业革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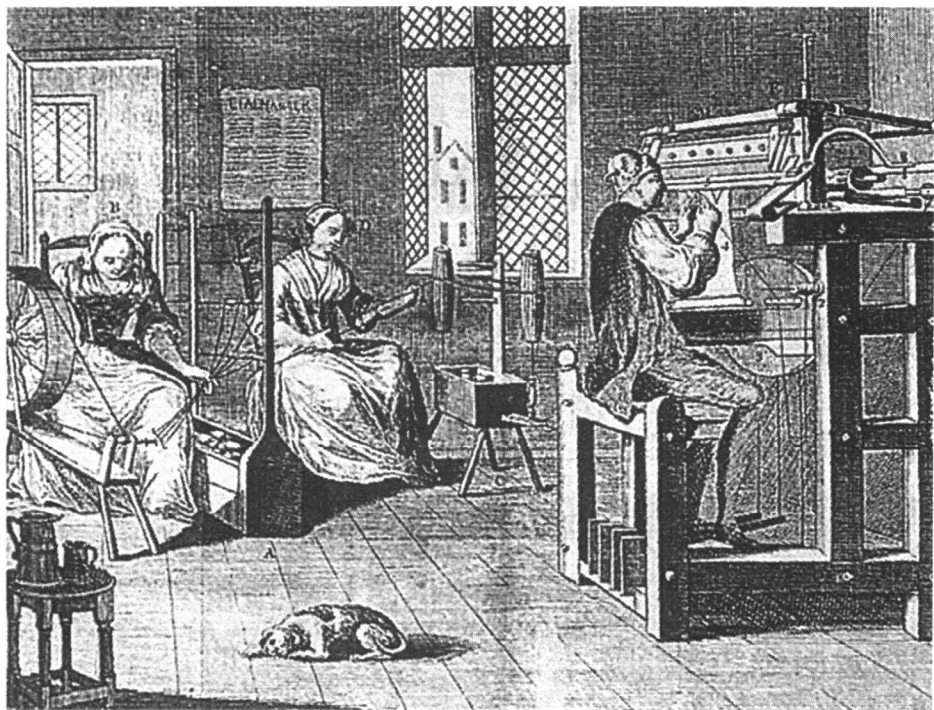
关键词 工业革命 工人阶级 分化重组

工业革命造成英国社会的严重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上层与下层形成鲜明反差,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人们不熟悉的是:在工业革命中,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重组,有些人经济地位上升,有些人经济地位下降,有些人受益,有些人受损,其情况并不能一概而论。工人阶级内部的地位变化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全面理解工业革命,了解这个时期英国社会的全貌,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一、什么是“工人阶级”

E.P.汤普森说:“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①他认为:“工人阶级”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形成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无数共同的“经历”使那些处在相同地位上的人意识到彼此之间的一致性,从而产生“认同”。这是一

①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毛纺织工人。

种阶级的认同,也就是阶级意识;而一旦阶级意识出现了,原来以个体存在的单个的工人就形成了“阶级”。汤普森说:英国工人阶级最终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当1832年议会改革把工人群众排除在外,使他们一无所得时。按照这种说法,工业革命的大部分时间英国工人阶级一直处在“形成”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并未成型。汤普森的说法有他的道理,因为工人内部有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有时他们的利益可能互相冲突,因此单以经济地位界定“阶级”就不够全面,还需要加上文化的因素,即“意识”;但本文为了表述的方便,仍把工业革命时

期的工人整体称为“工人阶级”,这一点必须首先说明。

那么,在工业革命时期,什么是“工人阶级”?按当时的看法及现在学者们一般的意见,工人阶级指的是“劳动的人”,即劳动者全体:working people。⁽¹⁾ 劳动者全体在当时有好多不同集团,划分成不同群体。如果按工作性质分,可分为三大类,即农业工人、仆佣和制造业中的工人总体。这三类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受工业革命的影响也不同。

第一类是农业工人。这是一个很古老的群体,早在中世纪中期,也就是黑死病之

(1) Cf. E. J. Hobsbaum, *Labouring Men*, London, 1979.

后就开始出现。但大批农业工人的出现则是在都铎时期,当时,由于社会结构及土地所有制的变动引起农业生产关系中出现一种三层结构,即地主—农场主—农业工人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地主(贵族或乡绅 aristocracy and gentry)拥有土地,农场主(farmers)租用土地,农业工人(labourers)则在土地上劳动。由此,地主收取地租,农场主赚取利润,农业工人争取工资。这种结构是英国的一个特殊现象,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出现过,而这种结构的存在,为英国早期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农业工人一直是一个庞大的集团,直到19世纪中叶都是最大的就业集团,1851年时有125万人,人数众多。这个集团从形成起就过着一种半封闭的生活,与世隔绝,安然自得,很少随时代发生变化,终日艰苦而不自知。这种状况正如1838年一段记叙所描述的:“他们活着时是强健有力的牲畜,从小长大,就世代学着扶犁耕地,赶车牵牛,以至最终承受男子的一切重负,长成一个扛大活的庄稼汉。……他长大了,去干活了,头脑简单而无知,辛劳终日不知苦,简直像头拉车的老黄牛。……他不看报,即使看了也认不得,假如东家念给他听,十之八九会听得打瞌睡。说实在的,他一点兴趣也没有。”^① 农业工人分散在土地上,世代经历着几乎同样的命运。

第二类是仆佣,也就是家庭佣工:仆人、花匠、厨师、奶妈、女佣、车夫等等。在一个等级制盛行的贵族社会,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他们存在的历史,比农业工人还要长。从18世纪起,英国中等阶级急速壮大,仆佣的人数也随之增长,1851—1871年间达到了全国就业人口的1/10—1/8,总数不下100万人,20世纪初甚至超过农业工人,成为最大的就业集团。仆佣比农业工人更分散,分散在各个东家,大的贵族庄园可以有一两百佣人,普通中等阶级家庭只有一两个,而且以女性居多。仆佣依附性强,本身的社会地位低,但又似乎是东家的家庭组成部分,其身份认同因此很复杂,并可能不时表现出荒唐色彩。仆佣的生活环境也几乎是几个世纪不变的,19世纪末一段描述说:“一般说来,一个佣人的天地就是拥有三四个佣人的厨房那么大,假如她能和这三四个人交成朋友,那就真的谢天谢地了。”^②其实,这也是17、18世纪的情况,甚至到20世纪上半叶也还大体不变。

第三类是最重要的类别,即制造业中的工人总体。这个类别是受工业革命影响最大的,工业革命时期,他们经历了最强烈的分化重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剧烈变动。这个类别是后来出现的“工人阶级”的真正母体,以后所谓的“工人阶级”,其实就是从这个类别中生长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特别关注。

(1) J.F.C. Harrison, *The Early Victorians 1832—1851*, London, 1971, p.39.

(2) Eugene C. Black, ed., *Victorian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1973, p.214.

这个大类还可以再分,到18世纪中叶,按工作场地看存在着三个种类:1.作坊中的工匠及帮工,2.家庭工业制中的手工工人,3.大型工作场地中的工人。工业革命开始后又形成一个新的种类,即工厂工人。工厂工人完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从小到大,人数从少到多,最后几乎囊括了整个的“工人阶级”。其他几个种类属于传统的“制造业”,存在很长时间了。工业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分化重组主要就发生在这四个群体中,所以引起我们最大的关注。

二、制造业中的工人

以下我们就集中谈制造业中的工人,由于后来许多国家都走上工业化道路,因此英国工业革命时的情况就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从17世纪开始,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据统计学家帕特里克·科克洪(Patrick Colquhoun)在1806年的统计,到19世纪初,工矿部门工人家庭在全国家庭总户数中占24.2%,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12.5%。这个数字是社会各集团所占比例最高的,可见它是社会第一个大集团。⁽¹⁾

不过如前所说,制造业中工人分四个种类:其中三个在工业革命前就存在,第四个产生于工业革命中。

所谓“作坊中的工匠及帮工”是指这样一些人:远从中世纪开始,“制造业”就组织

成行会,行会中师傅带徒弟,再加上几个帮手,就组成一个“铺子”即作坊,按行会的规矩生产某个特定产品,比如鞋子、刀铲、车辆等等。一般来说,铺子既是“厂”,又是“店”,生产和销售都在铺子里,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先有顾客订货,然后按客户要求生产。师傅与帮工、徒弟吃住都在一起,老板娘负责烧饭、清洗,白天干活,晚上睡觉,彼此如同一家人。费边社的工会史学家韦伯夫妇说:“在熟练手工业中有学徒资格的帮工,其社会地位直至近世都与其雇主相同,而且通常是同一行业或同类行业中另一个师傅的儿子……任何精力充沛的人充当工资雇用者的期限不会超过数年,勤勉的学徒即使不能娶师傅的女儿为妻,也都可以指望今后能自立开业。”⁽²⁾在这些人中,虽有“老板”、“帮工”之分,有“雇主”、“工人”之别,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却是一样的,一个人一生中的角色可以随时转换,比如幼年 is 学徒,青年是帮工,壮年是师傅(“老板”),年老了精力不济,就可能把铺子转让,又给别人去当帮工。所以,尽管这些人之间存在着“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却并非如工业革命之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那样。这样一个类型,是最早存在的制造业中的“劳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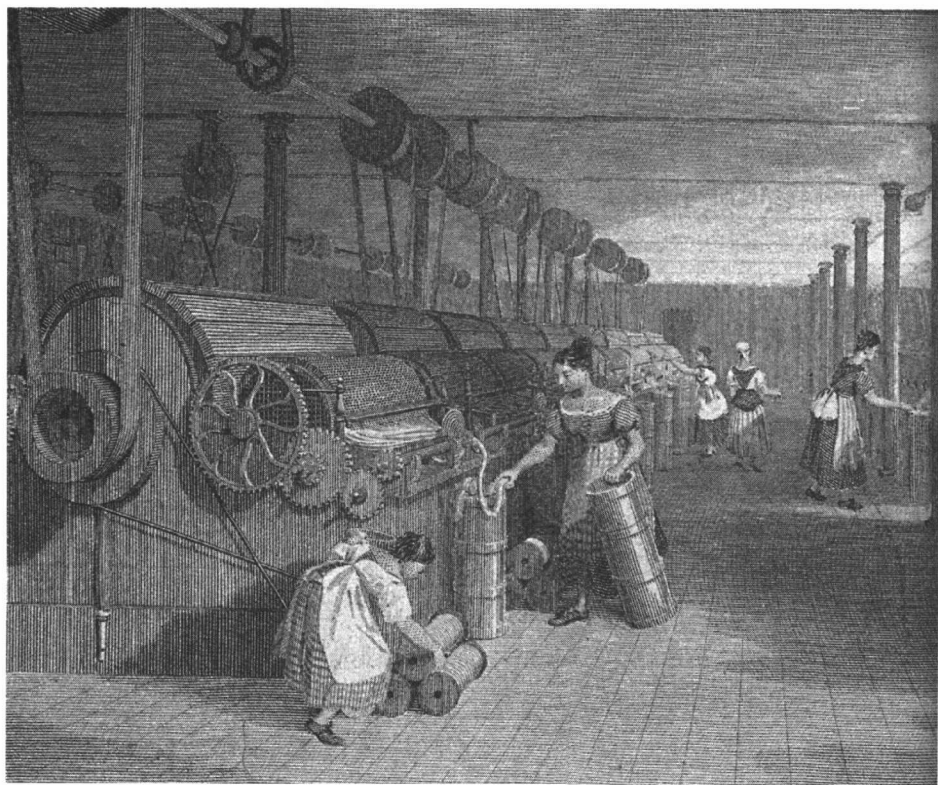
17世纪起,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在英国兴起,被称为“家庭工业制”。这种制度出现在一些技术含量低、不需要很长时间

(1) Cf. Patrick Colquhoun, *A Treatise on Indigence*, 1806.

(2) Sidney & Beatrice Webb, *The History of the Trade Unionism, 1666—1920*, London, 1919, p. 6.

的学徒训练就可以学会的生产部门,也可能产生在因实行了细致的劳动分工而降低了技术要求的行业中。在这些行业,行会制度被打破,商人控制了生产,商人把生产分解成若干程序,每一道程序上都有固定的专业工人进行加工。这些工人分布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他们从商人处领取原料或上一道工序加工出来的半原料、半成品,回到自己家中从事生产。一般是全家老幼一起上阵,共同参与生产过程。产品形成后,他们又交回给商人,按完成量领取报酬,实际上就是工资。当一道道工序全都完成后,商人就将其作为商品卖出去,往往用

于出口销售,这就是英国大规模出口贸易的商品来源,而纺织业就是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典型。19世纪初有一本小册子这样记叙工业革命前约克郡西区的毛纺织业情况:“有一批叫做羊毛商的颇有资本的人,在剪毛季节骑着马到处转,在养羊人那里收购羊毛。收购回来后就把毛仔细地分成级,然后把分好的毛小批小批地售出去,售到附近村落中无数资本微薄或根本没有资本的工匠师傅手中。这些工匠师傅就负责剩下的工序,有许多工作是在他们自己家里做的,其他的则分出去,分给邻人去做,邻人们这时就全家出动,夫妻子



19世纪的纱厂。

女们一起动手,织的织,梳的梳,刷的刷,纺的纺。”^①从表面上看,家庭工业制中的工人仍然是独立工匠,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工具并且是在自己家里生产,但实际上他们受制于商人,商人提供原料并回收产品,劳动者只是商人的雇工而已。但这些人于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工厂工人还不是一回事,他们仍旧是手工工人,并分散在各自家庭中,他们的雇主是商人而不是工厂主,他们是商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手工业劳动者。

第三个种类是大型工作场地中的工人,指的是在一些产业中,必须有相对集中的人同时工作,比如冶金、采矿、玻璃、造船、晒盐、烧砖、建筑业等等,一个工作场所会集中比较多的劳动力。大型工作场地的工人和其他两个种类有明显不同,他们的工作场所与家庭分离,他们必须集体劳动,受较多的纪律约束。这些工人显然靠领取工资过活,很难有自己立业的可能性,而且他们的受雇用地位可能是终生的,没有独立性,哪怕是表面上的独立都没有。因此,假如工业革命前存在什么“无产者”的话,那就是他们。但这些人总数不多,在工人整体中只是一个小数。多数情况下一个大型工作场地大概有几十人(比如炼铁高炉)或上百人(比如矿井),几百人的场所就不多见,虽说并非没有(如大型盐场);当然也有规模很大的,比如皇家造船厂,可以有几千人。

工厂工人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厂出现以后才产生。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工厂工人几乎涵盖一切,以至于所有工人都变成了“工厂工人”。但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他们却寥寥无几,星星点点地散布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工厂”里,不足以组成一个单独的“种类”。尤其要强调的是,最早的工厂工人都是童工、女工,男工不愿意进工厂,不愿受纪律的约束,更不愿丧失自己的独立身份。工厂被视为怪物,只有毫无生路的人才会进工厂。早期工厂主找不到雇工,就跑到伦敦孤儿院去把幼童们领来,让他们成为“工厂工人”,其命运当然会相当悲惨。另外一个来源就是女工,女性本来就独立性不强,为了贴补家用,可能会进工厂。童工和女工是早期工厂工人的主体,他们本是依附性极强的一个群体,没有什么地位,但就是这些童工和女工,把制造业中早已存在的其他三个种类中的男工、成年工全都打垮了,把他们逼上了饥饿的道路——把他们消灭,或把他们逼进工厂。最终,工厂吞噬了全体“工人”(working people),让他们在饥饿法则的支配下用机器创造利润,工业资本主义就是这样改变了英国的“工人阶级”。

三、分化与重组

工业革命改变了制造业工人总体的组成状况,使其出现重大的分化与重组,在这个过程中,无数人受到巨大影响,命运为之

^① *Observations on Woolen Machinery*, 1803, p.14.